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 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化

王义桅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除了贸易与投资的新兴变量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第三世界的代表这些传统优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应该在此基础上超越以往的外交观和国际观。面临失衡和失范的世界,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全球化等种种挑战,国际社会呼吁新的秩序观、文明观。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这“四化”作为新时期我国的外交主张与国家意志,这构成了中国国际文明观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文明观及国内政治文明建设也有个如何国际化的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如何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好接受中国的外交内政理念与国际形象,需要以政治文明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的公共外交体系问题,探讨如何塑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中国崛起的软国力建设。本文试图在这两方面有所探索。

关键词:政治文明;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崛起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X(2004)05-0014-11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长期以来,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局限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集中于中国古代文明领域。如何发掘中国古代文明的政治涵义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国际内涵并推广至世界,为解决失衡和失范的世界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以和平崛起为国家理念的中国所必须深入思考的话题。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文明已经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三大文明之一,但仍主要就国内层面而言。全面深入地分析政治文明思想,不能不涉及到国际领域,即探讨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及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化。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超越现代与传统

中国国际政治文明观的内涵,既包括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四化”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政治文明

作者简介:王义桅,国际关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讲师。

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也包括“和而不同”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明观。如何超越传统与现代,塑造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文明观,试以国际关系民主化(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为例阐述之。

一、什么是国际关系民主化

从实践角度讲,国际关系民主化并非新生事物,但其概念的比较明确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中国是其主要倡导者。从2000年4月“中非合作论坛”的明确提出到2001年11月胡锦涛同志访欧的讲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国际民主化的四方面内涵。胡锦涛同志指出:“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国际上的事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应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①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着眼于四个方面:

1.和平的保障

来北京参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强调说:“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多极化的基础之上。多极化与多边主义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它有利于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目标和理想,有利于各国展开对话、交流观点。国际关系民主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加利先生还强调说:“应该实现尊重法律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民主化。”^②

2.平等的基础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平等。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平等和自主,最根本的是就主权平等而言。正如冯绍雷教授指出的:“一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历史就是绝对主权走向相对主权的史。在这方面,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全球化都厥功甚伟。国际关系民主化限制了列强的传统的无限主权,如:在法理上剥夺了国家的战争权,基本结束了直接的和公开的领土扩张和殖民统治,用普遍主权(表现为非殖民化)取代了少数列强的主权,用相对主权取代了以强权和特权为特征的绝对主权。全球化用普遍的但绝非均等的主权限制(表现在经济、环境、基本人权等领域)继续了民主化使主权相对化的势头。”^③

3.多样化的事实

民主的精神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对差异的尊重和对少数的保护。只有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才能尊重国际社会多样化的事实,保护和尊重各国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将某一种制度、价值标准、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不是历史的进步,只能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和不公平。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西方学者指出,自1945年以来,有关人权的言论已成为权力和权威的来源之一,但西方人权理论由于过分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已受到来自伊斯兰世界、东亚和西方内部的严肃批评。^④事实上,“人权高于主权”言论就是不

尊重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的表现。

4.反霸的需要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必然要求各国主权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此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涵义还包括不干涉各国主权内部事务、共同协商的原则以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等。正如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联合国应该是各成员国共同协商、民主处理国际事务的场所。”^⑤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的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主要特征的“伙伴关系”就是这种民主原则的具体实施。

种种事实表明,我们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我们倡导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反对冷战思维,主张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多级化世界等主张一脉相承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单极世界的历史性、法理性否定,也是对霸权民主观、均势民主观、集体安全民主观的时代超越。

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从历史与逻辑上讲,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社会民主历程的必然产物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国际社会中的民主历程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程上溯至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而勃兴于全球化时代。它既是一种新生事物,也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继续。

从纵向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为前提的民族国家体系,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国际社会史的标准说法。国际社会史的修正说法是欧洲启蒙运动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它对在国际关系中施加民主角色的影响产生了两个长期的后果。一是引入了进步的观念:国家同意去推进它们的关系,克服利益冲突,这种合法的和外交的安排不再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而是一种通向最终解决之道的中继站。二是牢固地树立了民主价值而非民主自身的地位,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合法性的标准。但是,国际社会一直难以超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国际纷争总体上掩盖了国际协调,国际间的民主只是强权的产物,只有强者才有民主可言;而且国家越是强大,就越有资格垄断国际关系的民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国际社会终于在国际关系民主化艰难历程中有了质的飞越。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民族自决的兴起和民主价值的唤醒,集体安全的思想提出与实践,超越了传统均势逻辑,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则是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历程中迈出的最成功一步。权力产生的示范效应、非殖民化以及民主被视为现代性的必然要素,是导致民主在国际社会普及的重要原因。^⑥

战后,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5年4月由中国等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召开的万隆会议提出了包括“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等内容在内的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进一步引申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发展中国

家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大理念贡献。南南合作和各种区域性组织的建立与成功实践,不结盟运动、绿色运动、妇女运动等全球性运动的广泛开展,成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南北矛盾则是制约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兴起,尤其是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使国际关系民主化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切意识到自身的使命,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其重要标志就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重申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不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利于南方国家的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强调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决策进程。“今天,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上成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生力军。

从横向上说,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迫切呼唤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一,只有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世界多极化才是稳定的、和平的,而非近代欧洲史上大国均势纷争的重复,而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世界的多极化从结构上为世界力量的平衡和稳定提供了前提,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世界力量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

第二,只有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保障的全球化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减少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全球化是一多层次的辩证的过程,包含两个同时发生的趋势——同质性(homogenizing)与个性(particularizing)。^⑦只有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才能确保这两种趋势和谐发展,也才能确保全球化的人性化、民主化。不少人将全球化批评为“西方化”或“美国化”,因而出现反西方化、反资本主义化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一事实证明忽视全球化边缘国家尤其是所谓“失败国家”利益与发展要求的全球化将会对国际社会造成不稳定,诱发非对称性冲突。

事实上,效率与公正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两个基本目标。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是实现公正目标的重要途径与必然要求。同时,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与实践经验。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日益融合、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及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

当然,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如何协调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挑战,也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二)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哲学上讲,国际关系领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

表一：国际关系中的“二律背反”^⑧

内 容	层 次	关系中轴	表 征	矛盾显现
状态律	表 观	历 史	无序-有序	和 平
力量律	中 观	现 状	分-合	发 展
意志律	微 观	未 来	同化-异化	民 主

根据这三种矛盾律,和经济学有三大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民经济收支平衡)一样,国际关系的三大目标是和平、发展、民主,而安全则贯穿其中。

1.和平:全球化时代一个根本特征是,制约世界和平的根本矛盾之一从国内民主进程转向国际层面,并产生由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民主和平“三驾马车”组成所谓的“三角和平”构想。^⑨然而任何一方的深入发展都必须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保障。

首先,纵观国际组织的成败得失,地区性国际组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发形成的国际组织,如非统组织,较为成功,而全球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常常受大国控制,难以摆脱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干扰和侵蚀,其作用受大国关系影响较大。尽管这些国际组织往往以实现国际民主为宗旨。这说明,仅有民主实体并不能确保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其次,国际制度侧重于从静态角度为国际和平规划前景,但具体操作起来不排除违背初衷的可能,迫切需要从过程角度,动态化地保证国际民主的实现,而且国际制度民主还往往衍生出“制度霸权”的恶果,不能够解决权力与公正的矛盾。

再者,各国实现民主化之总和,并不等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民主和平论”的根本逻辑外延错误之一。同时,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往往还具有非和平性,蕴涵着不稳定。^⑩种种情形表明,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是从国家层面实现和平的继续,而且还将是其超越和升华。

2.发展:就像一国发展情况一样,制约国际社会发展的矛盾已从经济领域越来越转向政治层面。国际间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迫切呼唤国际关系民主化。正如2001年4月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拉友好合作的新世纪》的演讲中指出的:“新竞争、新矛盾、新挑战,使得世界的发展并不和谐。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没有得到改变,有些方面还在加剧。南北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扩大。因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⑪后来,江主席在“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和访问乌克兰时又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3.民主: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过去我们强调“以发展促和平,以和平保发展”,以这种循环式思维来解决和平与发展的矛盾,而且发展的涵义侧重于国内与地区,和平则侧重于国际层面。事实上,全球化时代表明,国内和平与国际层面的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迫切呼唤国内民主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的兴起,即是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对国际社会发展制约的成功标志与希望,它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制约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实现的根本矛盾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未能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上三方面目标集中体现在安全问题上——安全贯穿三大矛盾律,外超乎和平,内生于发展,寄希望于民主。我们因此倡导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安全观——主张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即通过平等协商对话,加强相互信任,追求共同安全。下文将表明,这正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9·11”事件清楚地表明,如果国际关系不民主,就难以保证国内与国际和平、发展与安全。

在现时代,国际关系的三大目标分别表现为状态——经济全球化;力量——世界多极化;意志——国际关系民主化。

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途径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与人类致力于国内民主化并行的奋斗历程。17-19世纪,是西方社会民主化的过程,20世纪则开始了世界性的民主化进程。到20世纪末,世界范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越过了它的高潮,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与国际民主化进程相比而言却要晚得多,原因是国际政治要远较国内政治复杂得多。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的区别正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别,后者是无政府状态的。

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近代史里最大的悲剧是没有能在国际关系中以公理代替强权。争端继续以相互残杀来解决。……为什么近代国家继续从事战争是有若干原因的。这些原因中最有力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政府去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的这种状态。……国家正象没有法律的人们,武装到牙齿,不服从任何法律和权威。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国际无政府状态。”^[1]

人类社会为以法律和和平代替国际无政府状态做出了种种尝试,如海牙会议便是为结束国际无政府状态而做出的最著名的努力之一,但是直到联合国成立为止,没有一次尝试是完全成功的。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曾试图对战争加以制止,但是教会并没有强大到能够防止一切冲突,在后期尤其是这样。国际关系民主化才是人类找到的比较成功的努力方向,它超越了和超越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提法本身是未能挣脱现实主义思维的表现。这种思维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泾渭分明,认为国内民主是必然的,而国际关系民主只能是天方夜谭。事实上,这是一种既得利益的强者思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已在改变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关系民主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前提。

如何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了他的系统看法: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化有必要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一是尽可能地发挥其现有设想的民主潜能,并改革那些未充分体现的民主结构。业已建立的联合国系统本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要给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主体提供得到认可的参与正式体系(迄今这主要指国家体系)的手段,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新任务。三是在国际间造就一种民主文化。“这不仅需要一个忠诚于民主原则与过程的国际社会,还要求有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公民社会,它根植于民主的组织制度(不论是国内、国家间还是超国家性质的,私人还是半私人性质的)之中,奉行民主的实践、程序和政治多元主义,并由浸润着自古以来就与民主习惯的开放、公正和宽容等习性的民族所构成。”^[2]

概括地说,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必须从四方面着手:

1.主体: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体是国际社会的全体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跨国公司等),而其关键在于实现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2.客体: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先导,世界多极化则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建立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机制是努力方向,解决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非均衡发展问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与成功标志。

3.过程:只有民主程序,才能真正确保国际关系民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出,使国际关系发展目标——和平、发展、民主,从过去对结果的强调转至对过程、程序的重视。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该是目前重点努力的方向。为此,要改革联合国,使之世界贸易组织(WTO)化,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使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地参与国际决策进程。

4.环境:全球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其生长环境。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宪章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应该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石。反之,只有以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秩序和架构,才更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才能引导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

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前景

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国家的兴起就已预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未来前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更极大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努力;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则切实地增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努力……种种因素表明,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新的世纪里必将获得更积极的发展。

纵观世界历史,人权、人道主义等起初都发轫于一国国内,而现今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民主应该也不例外,而且与这些人类的基本目标相呼应:“尽管民主化必须在人类社会所有(地方的、国内的、地区的和全球的)层次上发生,民主化的独特力量在于其本身的逻辑之中,该逻辑以个人这个世界中不可再分的实体和所有人权的逻辑源泉为起点。”^[10]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一定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当然,民主化不能保证最好,但可以避免最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未来不在于解决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问题,而在于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创造必要的程序与机制前提。

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中国外交的新旗帜,既是以前中国“争取第二世界,着眼于第三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等外交实践的历史继承,又是重大外交理念创新,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它比单纯的“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提法更能争取国际舆论,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新时期贯彻“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十六字方针的伟大创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更有利于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还有助于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观,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中国基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积极推动亚欧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种种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上海五国”外长2001年4月28日会晤签署《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上海

五国”的活动是对实现多极世界格局构想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贡献。

但是,我们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景并非一味乐观的,对其困难性和障碍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国际关系民主化既有来自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动力,也有来自既得利益方面的阻力。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是其实现的首要困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也在于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大国,也是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往往不喜欢国际关系民主化,出于“山巅之城”的优越,对外部世界历来抱有不信任感,鼓吹国内民主而推行国际霸权;当今世界,国际力量结构严重失衡;“北强南弱”局面仍在加剧,给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只要国际关系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就会盛行强权政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在尚未真正实现多极化的世界里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有着特殊的困难性,国际关系民主化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样,基本上是一个长期目标,其进程一定会充满荆棘和曲折。

五、国际政治文明观的全面内涵

除“四化”外,中国国际政治文明观中较突出的还有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将中国的“四化”国际政治文明观政策化,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途径将其实践化。

传统国际政治文明观以“和而不同”思想为突出代表。发展模式多样化是其理念的现代延伸。2002年10月,江主席访问美国时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观的现代延伸和国际内涵。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催生中国和平崛起战略,而其实现途径突出地包括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两者分别是中国超越传统与现代国际政治文明观的重大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化:公共外交与和平崛起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不能只停留在脑海里和我们国内舆论圈圈,更应走向世界,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同。这就是通过外交塑造国际政治文明观念,展示中国外交意志。相比之下,外交工作如何赢得民心,是我国过去比较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如何赢得国内民心,争取国内民众对外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如何赢得国外民心,改变国外民众对本国的看法。前者就是所谓的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后者属于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所谓公共外交就是一国政府通过

信息和语言去赢得国外民心的外交形式,而公共事务的最大任务则是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的政策和目的,更多属国内事务范畴。^⑤美国国务院设立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一职,就是兼顾这两方面的工作。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就是要改变国外对中国的看法,纠正盛行多时的中国威胁观,使得中国日益增加的综合国力能够为外部世界所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外交政府对政府或民间对民间的狭隘与单调,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开展针对外国民间的公共外交。

“9·11”事件后,美国重拾公共外交武器,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的问题,力求挽救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形象,通过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等推销美国的“反恐”政策、“反恐”理念与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观念。美国的经验表明,开展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塑造国际形象、推行外交政策和传播国家观念,一句话,增进国家的软权力。^⑥美国的做法对于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启示呢?

1. 和平塑造: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过去,对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存有不少错误观念或心态,较典型的有:①将国际形象与国力等同起来,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会尊重你。但如何解释瑞士、北欧国家国力并非强大,国际形象却十分好;美国国力如此强大,但国际形象却很糟糕?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少谈中国的软国力;忽略国家的亲和力,即国际社会对你的亲近和喜欢程度,这是中国威胁论产生、蔓延和强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②与此相关的是,重视国际地位,忽视国际形象。在朝贡体系下,我们特别在乎中华民族的威望,现在则有重“威”忽“望”之势。③发展战略中偏经济、轻文化,而文化也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对现代中国形象宣传不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进一步走向世界。④认为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敏于行而讷于言,忽视在国际社会去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⑤以历史、文化大国自居,认为国际社会不了解我历史和文化,因而不尊重中国;而外国民众也常常只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对现在的中国并不了解。我们心态则是,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理应受到世界的尊重。但历史上的尊重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在的魅力,更有甚者还带有受害者心态希望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具体做法常常是拷贝国内宣传做法,开展对外宣传或公关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

带有以上错误或模糊认识,致使传统中国外交重视国家间关系和高级政治(如政府外交、首脑外交等传统外交,关注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忽视外国国民对中国的认可程度及低级政治(如环境问题、社会安全问题、文化、跨国界事务等)。比如,认为中美关系好了,美国人就对中国友好。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白宫对华施好而国会山反华之声仍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长期游离于主流国际社会之外,国际形象主要是内政问题的某种折射;在此之后,内政问题也一直是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恒常因素,甚至一度是主导因素。国际形象表达往往比较被动:如果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⑦。在资讯时代更是如此了。内政问题首先是中国由于体制、人权、新闻自由等方面与西方标准存在差距,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次是国家统一问题,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之后,最主要的就是台湾问题了。台湾问题成为考

验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与中国国际形象的长远挑战。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存在对方和我方两方面的原因。对方原因包括:不了解中国国情、意识形态的隔阂、不信任等;我方原因有不重视外部世界的反映、不善于推销自己等。针对国际社会对我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够了解,近年来,我国政府经常以《白皮书》的形式加以正面、详细阐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1980年起先后批准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和协定书,并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更是消除了国外舆论对中国政府的诋毁,使得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一同提升。

2.和平崛起:推行中国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威胁论”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主要制约。其中也蕴涵着一个悖论:以中美关系为例,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¹⁸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中国强大了就会威胁人家的逻辑,增强对中国的信任。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以做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从以下方面着手:

——目标: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中国,是我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定位,长远上看是服从于中国国家发展的定位,积极配合“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循序渐进地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向“中性-正面-亲近”转换。

——手段:关键是树立政府在国内的亲民、民主形象,中国驻外机构也要首先保护好每一个中国公民、侨民在海外的民间利益;其次通过开展文化广播的国际交流形式,利用当地国家的电台、电视台渠道播放中国新闻娱乐节目,利用当地华侨、留学生和对华投资跨国公司开展针对母国的形象宣传活动,如“创意中国”、文化营销国家活动,塑造充满活力的、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性的国家形象,重视“国家品牌塑造”。

——重点:鉴于“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个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了的形象”(刘康语),¹⁹我们抓住美国和欧洲这些影响世界舆论的重点,及时为欧美国家“憎恨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举措消毒,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传递中国的声音,善于与非政府组织与全球公民社会打交道,突破传统公共外交困境,以朝鲜问题为切入点,实现从内政问题的被动纠葛到国际行为的主导塑造为主,树立起做负责任大国形象。

——机构:整合中联部与外交部工作,设立负责分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司长,统一协调外交系统的公共外交工作,从国务院新闻办中分设国务院信息局,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

3.和而不同:传播中国外交观念

事实表明,公共外交是更好发挥一国“软权力”的重要手段,它突破了传统外交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对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认同,这与东方朝贡体系时期中国的“德治”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也因此更有理由更有可能开展成功的公共外交以塑造自己的软权力体系,丰富我们综合国力的概念。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意义在于,将彻底解决1840年以来东西方国际体系的矛盾,兼具文明古

国的复兴与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因而,旨在塑造中国和平崛起国际舆论环境的公共外交,就要兼顾以“四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国际政治文明观和以“和而不同”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明观;同时,公共外交的目标不是简单塑造历史上朝贡体系的中国威望,把其它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简单归结为敬畏还是心悦诚服,而是将其思想纳入国家发展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负责任的大国”。通过举办APEC和即将承办的奥运会、“世博会”,我们更应该走出去,开展积极主动的公共外交,不应局限于传媒/技术层面,也不仅仅是国内树立政府的亲民、负责任形象,更是保护好海外侨民的利益;驻外使领馆不仅仅是执行政府任务,更应关注、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仅仅是搞国际公关,推销中国,而更是通过多边外交的形式,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在的活力,手段方式为国际社会所喜闻乐见。

注释:

①新华社巴黎2001年11月5日电。

②《人民日报》2001年09月14日第七版。

③冯绍雷、卿文辉、范军《关于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北京)1999年第3期。

④迈克尔·伊格尔纳季耶夫《对人权的批评》,《外交》季刊2001年11/12月份。

⑤《人民日报》2000年9月7日。

⑥See James Mayall,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2000, Vol.76, No.1.

⑦Sabihah Osman,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respons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Sarawak", *Third World Quarterly*, Dec2000, Vol.21No.6, pp.977-989.

⑧另见拙文《均势与国际秩序:冷战后时代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2001年第2期。

⑨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1.

⑩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⑪《人民日报》2001年4月7日。

⑫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北京:三联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7-1108页。

⑬加利《联合国与民主化》,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7页。

⑭加利,见上引文,第356页。

⑮关于公共外交的概念,参见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⑯关于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做法与经验,参见唐小松、王义桅《从‘进攻’到‘防御’: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角色变迁》,《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⑰原文“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出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⑱卢咏《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治形象》,《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廿九期2003-07-30。

⑲《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刘康与李希光的对话》,《环球时报》1999年8月6日第11版。